
從非營利組織執行新住民／移工影像培力工作坊探究 姊妹情誼的願景與限制*

柯妧青**

摘要

本研究透過3家執行新住民／移工姊妹影像培力課程的非營利組織，探究以性別認同為號召的「姊妹情誼」在組織任務推動上的作用與角色，以及姊妹社群成員在國族、階級與文化差異下多元交織的主體認同。研究發現，新住民／移工姊妹的作品普遍具有性別意識與族群意識，「公共議題的認同」以及「個人學習需求」是其參與組織課程的主因，然而，私人性質的「姊妹情義相挺」是多數新住民／移工姊妹完成影片的重要前提，顯示姊妹情誼在組織社群之間具有不可低估的凝聚力與行動力，但亦反應了其在「反抗父權體制壓迫」的集體行動與集體認同上的限制。高門檻的拍片行動深化姊妹之間的革命情感，有助轉化為公共性的社會參與，就現實層面而言，私人「交陪」式的姊妹情誼不易轉化為具公共意涵的社會行動，但若缺乏私領域的姊妹情誼支撐，具公共性與社會運動意涵的姊妹情誼亦無法產生。

關鍵詞：姊妹情誼、新住民／移工、影像培力行動、非營利組織、自我敘事影片

*誌謝：本文接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9-2410-H-030-016)的補助，感謝執行影像培力工作坊的非營利組織社工、學習支持者，以及參與拍片的新住民、移工與新二代等 11 位姊妹們對於本研究計畫的支持。作者亦感謝期刊審查委員給予的寶貴建議與指正。

**柯妧青為輔仁大學影像傳播學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wanching.ko@gmail.com

壹、緣起：當組織社群號召新住民及移工姊妹們一起拍片

隨著數位媒體科技的快速發展，影片製作軟硬體設施愈來愈便利且容易接近，不再由影視業財團所壟斷，當專業技術門檻降低且設備價格愈來愈親民之下，素人也有機會拍片。自 2000 年之後，臺灣民間社區大學、非營利組織與其他非正式教育機構紛紛在各地開設「紀錄片／影像工作坊」、「社區影像培力營」與「紀錄片影像教育營」課程，將其做為公民參與的行動方案，透過庶民的視野與觀點，為社會注入更多元的文化內涵。全球化推波助瀾之下，婚姻新住民及移工人口在這個時間點亦大量移入臺灣，因性別、階級、族群、種族、宗教差異而被邊陲化的「他／她者」，其基本人權受到社會工作者及非營利組織的關注，2007-2012 年間，包括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南洋臺灣姊妹會、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等民間社團組織，紛紛開辦東南亞新住民／移工影像工作坊，透過第一人稱自我敘事影片傳達社會的多元聲音與觀點。

新住民／移工影像培力工作坊的任務，在於賦予社會邊陲者話語權，自我書寫以對抗主流文化霸權及其媒體再現，其完成的作品具對話性，可以視為一種社會行動。然而，非主流族群影像實踐與培力工作的真實樣貌是什麼？研究者兼具專業影視工作者的身份，基於個人核心關懷，當智慧型手機開始盛行且人手一機的機緣之下，曾於 2016 及 2019 年兩度執行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工作坊，教導菲律賓籍以及印尼籍女移工以手機「自己拍自己」，產製第一人稱自我敘事影片。首度執行時才發現想法過於天真，不僅「不知去哪裡招募移工學員」，還遇到「招募不到移工學員」的窘境，多虧民間非營利組織的協助，透過其社群連結始有移工參與並順利開課。回顧執行過程經歷諸多超乎預期的困難與挑戰，幸獲組織社工的協助與實質支持始得以完成影片，深深感受到社會工作者與其服務對象—移工姊妹之間所建立的社群凝聚力不可小覷，亦覺察自己和移工之間因為族群、文化背景甚或階級上的差異，即便努力維持社群連結強度，但仍力有未逮。舉例來說，對於菲籍與印尼籍女移工學員而言，跟著同鄉（同國籍）男性友人聚餐，比起跟著同為女性的臺灣籍培力者（研究者）一起出遊，似乎更為自在且有歸屬感。

社會支持網絡對於推動成人非正統教學及社會實踐，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在各種不同的學習支持體系當中，情感連結與支持度是值得關注的議題。以南洋臺灣姊妹會為例，其透過社會運動以及自製影片《姊妹賣冬瓜》（2010）進行社會倡議的過程，姊妹情感的支持與互助功不可沒。研究者教導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的過程中觀察發現，協力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與來自於菲律賓的女廠工、以及女廠工彼此之間，確實存在姊妹情誼，那是一種精神層面與心理層面相互扶持與鼓勵的力量，不禁猜想或許因非營利組織長期耕耘，幫助移工姊妹克服及處理生活上的大小事，內部社群建立深厚的認同感，再加上女性移工學員皆來自兩家電子工廠，她們在族群、性別甚或同為移工的階級身分上，所處的位置與社會處境相同，有助相互理解並產生集體認同感，故而號召姊妹們參與具社會行動意涵的事務時，較能動員成功。

然而有趣的是，某非營利組織社工幹部無意間曾與研究者分享，其為新住民姊妹開辦的自我敘事影片製作工作坊，執行過程遇到了一些困難與挑戰，諸如身兼協會幹部與影像培力者，職務分配難以同時兼顧並有身份切換上的尷尬；再者，新住民姊妹因工作與生活忙碌，無力持續參與拍片計畫；甚或最後完成的影片亦曾遭審查委員指為「缺乏社會性」，使其略感受挫。經由這次對話經驗，研究者方才意識到原來非營利組織在影像培力工作坊的活動規劃與執行上，亦遭遇到某些的困難、限制與挑戰，原以為組織與服務對象（新住民姊妹）因長期的互動與生活支持，彼此之間已建立深厚的姊妹情誼，得以讓新住民姊妹全程參與影像培力計畫，但現實情況恐不盡如此。

貳、問題意識與研究問題

自 21 世紀開始，數位影音科技產品已日趨普及化，影片製作的門檻大幅降低，然而相較於聯誼性質的活動，以及其他如陶藝、繪本、故事書或戲劇表演課程，影像培力課程所需要的專業知能及技術門檻仍舊為高，不僅對於初學者而言具有一定的困難度與挑戰性，對於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而言亦是如此，若人力、技術、設備等資源未有足夠的準備與評估，貿然投入恐將「自找麻煩」，故而民間以新住民／移工為對象開辦影像培力工作坊

課程的組織仍屬少數。令人好奇的是在現實情況下，新住民／移工姊妹平日忙碌於工作與生活，常常有自顧不暇的情況，她們有什麼重要的原因或動力犧牲休息時間參加影像培力課程？那麼，決定參與拍片計畫的新住民與移工姊妹，究竟為何而願意加入組織舉辦的進階課程與活動？當組織及其內部社工期待藉由自我敘事拍片行動，為姊妹們培力並達到社會對話的目的之下，被招募前來「學習」的姊妹們是基於性別認同的號召或因人情壓力而加入課程，抑或單純基於個人成長與自我實踐的心理需求？她們的主體性與認同感如何形成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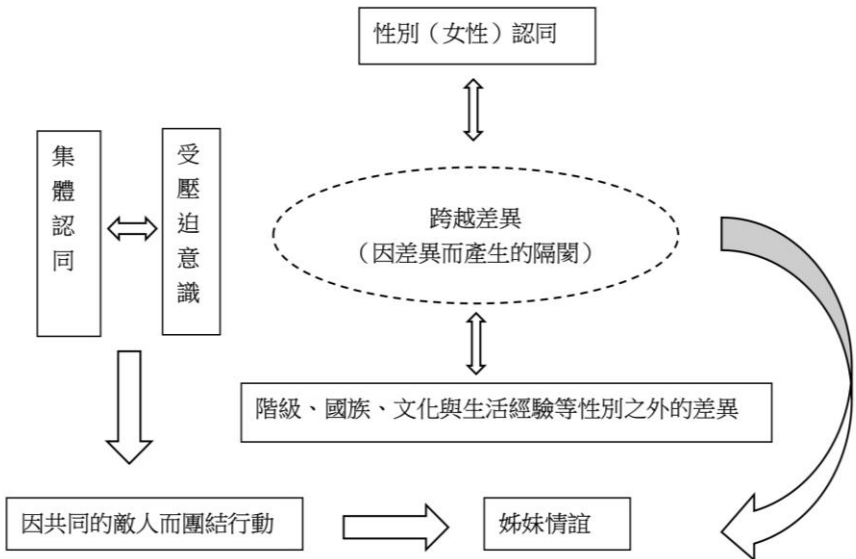
本研究以女性主義「姊妹情誼」(sisterhood)觀點做為研究核心，問題意識來自於個人執行東南亞移工影像培力行動過程的觀察與好奇，希冀透過民間非營利組織號召女性新住民及移工參與高門檻的影像培力行動，深入了解「姊妹情誼」在什麼樣的條件與脈絡下產生，及其於多元文化交織下的可能性與限制。「姊妹情誼」一詞在不同的社會運動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定義與主張，廣義來說，它是一種女性之間相互支持、關懷以及表現親密關係的模式，有助於自我認同的產生；若以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姊妹情誼是一種認同政治，女性們透過結盟以對抗父權的壓迫（游美惠，2011）。本研究欲了解的研究問題包括：第一，影像培力工作坊開辦過程中，性別認同對於新住民／移工姊妹活動參與的意義與作用為何？其作品呈現出什麼樣的性別意識或是社會對話意涵？第二，姊妹情誼在新住民／移工女性自我再現影片製作的社會行動中，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面臨了什麼樣的限制？第三，非營利組織工作者身為培力者，跟學習支持者（新住民或移工）雖同具女性身份，但因為族群、階級與文化認同上的差異而處於不同位置，組織內部成員如何在影像培力行動中跨越差異、處理差異並彼此認同，以達成任務？

國內以新住民及移工為主體的研究在 2000 年後如雨後春筍般興起，諸多學術領域與學門所產製的相關論文數量極為可觀，具體反應臺灣的社會變遷與多元文化發展的真實樣貌，然而，截至目前為止，以新住民或移工影像培力工作坊做為研究對象之論文相當稀少，以女性主義與多元文化理論為基礎，透過姊妹情誼探究新住民及移工影像培力工作坊成員在族群、性別與階級差異之下的多元文化交織性之研究尚未可見。本研究藉由組織

推動影像培力的社會行動個案，透過廣義面向以及具社會運動面向的姊妹情誼理論進行整體性檢視，探究其在性別、族群與階級差異下的發展脈絡與內涵，挖掘此一社會現象背後隱含的性別與多元文化議題，以理解並反思當代多元文化發展情境下真實的社會現狀，希冀提供獨特的研究視角與觀點，為本土多元文化與性別研究注入嶄新的研究領域，並具體反應臺灣本土文化的發展與脈動。

本研究所稱非營利組織（NPO），係指長期耕耘、為東南亞新住民／移工提供生活、工作與學習等面向協助與支持的社區型非營利組織，文中所稱培力者泛指學習支持者，包括非營利組織社工、具影像專業之外部協作教師或助理。選擇以非營利組織舉辦之影像培力工作坊進行研究的原因有二，第一，影片拍攝的困難度及門檻較高，參與者需要較高的內在動力，適合探究「姊妹情誼」於此一行動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關係。第二，非主流族群自我產製的影片涉及自我詮釋的培力行動與主體性之展現，有其社會意涵。研究概念構想如圖 1 所示。

圖 1：研究假設及概念圖



參、文獻探討

一、非營利組織開辦新住民／移工自我敘事培力課程及其相關研究

90 年代末期，臺灣人開始拍攝以新移民女性為題材的紀錄片，王君琦（2018）指出，這些紀錄片與主流媒體的報導有所不同，大多透過長時間的貼身觀察將事件脈絡化，並以訪談等手法給予被拍攝的新移民姊妹更多陳述空間；柯婉青（2015）認為相較於主流媒體，影像工作者具有較開放的多元文化觀點，勇於透過影片挑戰既有的社會體制與文化認同。王君琦（2018）同時反思指出，儘管被拍攝的新移民女性對自己如何被再現行使了同意權，影片的觀點最終仍屬於拍攝者，對此，成露茜（2009）亦曾提出類似的看法，她表示另類媒體的發展若只停留在「為」弱勢發聲，而無法讓弱勢者成為發聲的主體並自主地與社會對話，很難避免另類媒體及被報導者之間已存在的話語能力差異及結構性的權力關係。因此，她強調應該讓弱勢者自行掌握媒介，用自己所熟悉的語言自主發聲，並和社會溝通，文化才能自主且多元展現。

因應這樣的社會意識發展，約自 2007 年起，臺灣開始出現非營利組織為東南亞新住民及移工姊妹開辦自我敘事影片製作課程，讓居於社會邊陲的非主流族群有機會自我詮釋、抒發感想並與社會對話，從被凝視的「她者」轉為主動凝視世界的「我」，顛覆傳統影片作者與觀看者的角色與位置。這類影像培力工作坊課程，主要教導姊妹們展現主體性，拍攝及製作影片與社會進行對話，這些第一人稱自我敘事影片，挑戰主流媒體對於「她／他者」再現，可以視為一種「另類媒體」，亦是李臺芳（1996）所述女性主義電影所稱的「另類電影」與「反主流電影」（counter-cinema）。

國內以東南亞新住民女性為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的文獻相當可觀，並有部份論文討論新住民女性如何被再現，然而，以新住民女性自我再現影像培力行動做為研究主體的論文並不多見，少數幾篇討論東南亞新住民女性自我再現影像培力行動的研究當中，柯婉青（2015）指出「自拍影片」行動有助學習者重建自信心、自我觀照並自我肯定、克服困難與解決問題，同時亦有助思想啟蒙與觀點建構；王君琦（2018）表示，因為影片拍攝的門檻和要求比其他表現形式都高，這也促使她們（新住民姊妹）發揮出創

作所需要的感知、想像與見解等等不同於日常生活的能力。此外，亦有研究以東南亞女性移工拍片工作坊為場域，透過批判識讀教育觀點進行探究，該文（柯旻青，2019）指出移工的感知與覺察力雖有差別，以提問（*problem-posing*）及對話（*dialogue*）方式引導其透過生命經驗與個人故事進行反身性思考，確能呈現具主體性的對話文本。上述研究均肯定 NPO 為非主流族群量身打造的自我敘事影片課程具有培力效果，開啟了東南亞新住民及移工姊妹的能動性，並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理解。

值得進一步思考的是，新住民及移工影像培力工作坊成立過程，究竟組織如何號召姊妹們共同參與此一社會行動，特別是影音製作在技術與執行上具有較高的門檻，非營利組織如何形成內部的集體認同與凝聚力，以完成組織所交付的任務與使命並不至於功虧一簣，組織的內部連結與情感支持如何在學習型社會行動中發揮作用，令人好奇。Walker et al.（1993）指出，社會支持至少包含情感性支持、物質性支持、資訊的支持及陪伴等四種類型，而連結的強度和提供的支持成高度正相關。若從人際網絡關係來看，女性社群所形成的網絡關係，除了獲得工具性支持之外，特別能得到情感的支持（方雅慧、何青蓉，2015），亦即女性社群較容易產生情感支持與人際關係的連結，也就是廣義上的「姊妹情誼」。究竟非營利組織如何號召姊妹們參與影像培力及自我再現紀錄影片創作，在這個行動過程，社群人際關係的連結與凝聚力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產生了什麼樣的行動力，值得關注與討論。

二、女性主義多元交織理論下的「姊妹情誼」

女性主義學者在不同的社會運動發展階段，對於姊妹情誼有不同的定義與主張，大致上可分為廣義的姊妹情誼以及具社會運動與解放精神的姊妹情誼。游美惠（2011）指出，廣義的姊妹情誼是一種相互扶持、關懷與表現親密關係的方式，有助於自我認同的產生；社會運動解放觀點的姊妹情誼，是一種政治性的團結力量，有助政治聯盟以及集體認同與自我認同，引領女性們透過結盟以對抗父權的壓迫。當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興起時，Morgan 提出‘*sisterhood is powerful*’（姊妹力量大）口號，以行動表現其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承諾（Morgan, 1970），此後，以姊妹情誼為基礎的女性

運動從美國開始向世界各國拓展，姊妹情誼的概念變成了團結的理論（Magarey, 2014），即便是素未謀面的陌生女子，也因為相同的性別而享有休戚與共的「患難」情感（梁莉芳，2000）。然而，Magarey（2014）也提到，從美國影響至澳洲的姊妹情誼口號與行動，在 1970 年代後期因缺乏組織變成混亂的運動，讓諸多參與者感覺是在浪費時間和力氣，後來更因為差異（difference）而產生階級上的鬥爭，包括女同志遭到女性主義者歧視，所謂的姊妹情誼出現內部矛盾。

bell hooks 和 Bonnie Thornton Dill 等美國黑人女性主義學者反對將女人生活經驗普同化，hooks（2015:45-47）指出，女性主義不能忽視彼此之間族群、階級的差異，女人不再只是要面對共同敵人（男人）而團結在一起，而是要改變所有造成壓迫和歧視的結構；Dill（1994）表示，姊妹情誼概念揭示了女性在父權體制下受壓迫的共同經驗，但卻沒有揭露不同族群／階級婦女在生活經驗上的相似和差異。所謂的「差異政治」是以差異性為前提的溝通民主，正視所有被壓迫的邊緣群體的差異需求（Young, 1990），繼「做性別」（doing gender）理論之後，Candace West 和 Sarah Fenstermaker 提出「做差異」（doing difference）的延伸概念，強調種族、階級的範疇和性別一樣需要在人際互動中被確認，任何「做性別」的活動同時展演出種族與階級的社會差異（West & Fenstermaker, 1995；藍佩嘉，2004），如同女性主義的「差異政治」論述，每個主體的性別、種族與階級的多重身份並存，在現實生活中同時產生作用。

多元交織的女性主義觀點主張將性別、族群、階級及生活中其他可能造成歧視與壓迫的因素納入考量，並強調女性身分與其他社會／文化身分的重疊性，女性的壓迫經驗是交織在種族、階級、文化身分下形成的多重壓迫形貌（陳昭如，2013），確實，女人是各種身分類屬之一，不能只從性別向度角度介入。夏曉鵬（2006）指出，當「差異政治」取而代之成為女性主義論述的共識，位居優勢位置的女性主義論述和運動者，皆極力避免為不同階級和種族的女性「代言」，以免重蹈姊妹情誼論述的錯誤。綜合上述不禁令人好奇，看見種族、階級等面向的差異後，是否意謂著女性結盟的姊妹情誼已走到了盡頭？以性別意識號召的女性結盟還有可能嗎？夏曉鵬（2006）認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性別的議題必然是全球性的，例

如第三世界女工受跨國公司剝削，與第一世界國家女性因資本家出走造成生活困境，彼此之間是一體兩面，她指出，儘管女性之間的確有差異性，但有些普遍性議題使婦女運動的推動仍有賴團結與合作。

然而，「差異」究竟如何跨越才不致淪為紙上談兵？針對女性主義結盟的倫理議題，Lyshaug（2006）表示女性之間的團結（solidarity）與結盟（coalition building）若是沒有姊妹情誼與情感為基礎，其實是有問題的，在面對女性存在於族群及階級上的差異，她主張「培養擴大的同情」（cultivate ‘enlarged sympathy’），以跨越女性之間差異的缺口，並彼此認同。另外，Yuval-Davis（1997）提出了「橫向政治」（transversal politics）的概念，企圖在普遍性／相對性二分法之外開闢新路，她主張所有女性主義政治都應該看成一種聯盟政治，女性之間的差異得到承認並可以發聲，而這個聯盟的界定依據不應是身份，而是想要達到什麼目標。也就是說大家的「根」雖有差異，但擁有類似價值觀和目標才能對話。橫向政治的對話並非是沒有邊界的，所有的利益衝突也並非都可以調和，最重要的是橫向政治區別了社會身份和社會價值，並假定「認識論上的共同體」可以跨越不同的位置和身份而存在（Yuval-Davis, 1997；夏曉鵬，2006）。綜言之，或許當女性願意正視彼此的差異、承認差異且尊重差異的情況之下，在共同關心且認同的社會議題上集結行動，便能如同 hooks（2014）所說，當女人之間創造出可以珍視差異及複雜性的女性空間，植基於政治團結的姊妹情誼就會出現。

三、姊妹情誼與社群組織工作的關係及集體認同

以本土新住民姊妹影像工作坊為研究對象的文獻中，王君琦（2018）指出，姊妹們因為加入影像工作坊，更能更深入了解、感受其他姊妹的生活和每個人不同的遭遇，或是獲得了從細微處觀察其他姊妹生活的機會，並且多了透過拍攝幫助其他姊妹的能力，包括拍出其他姊妹的故事，參與者之間建立相互扶持的情感與生活支持系統，並發展出姊妹情誼與連帶基礎，這也呼應 Nussbaum（2003）所述「可以對他人表達關懷、體會他人處境，亦即與他人產生連結的社會互動的能力」的歸屬感。林津如（2008）等人透過非營利組織工作者為東南亞新住民姊妹規劃的「女性記憶創作工

作坊」進行研究，從共同受壓迫的處境為起點，探究透過深化姊妹情誼如何能使一個新移民組織的運作更順暢，該文將姊妹情誼視為「關係範疇」並指出，當組織成員（新住民姊妹）有摩擦時將影響到會務運作，故而建立相互溝通與容忍差異的姊妹情誼十分重要。文中提及組織工作涉及三個層次：第一，從共同壓迫的處境出發，第二，發展姊妹情誼，第三，提升姊妹公共參與的動能。社運工作者對於第一層次擁有具體操作方法和熱情自信，但在第二、第三層次較少討論，然而第二層次卻是組織工作困難的地方，南洋臺灣姊妹會因此藉由舉辦工作坊凝聚團體的情感與向心力。

根據上述研究及討論來看，組織以工作坊形式推動拍片任務與目標，亦有助內部社群建立姊妹情誼，兩者相輔相成並相伴同行。然而，以父權體制壓迫做為性別集結的號召，能否在組織的集結認同上發揮功效？在性別、階級與國族（族群）差異的多元文化交織之下，姊妹們以性別認同為號召，並為了共同的願景與目標而集結，但若在社會行動參與過程中忽略階級與族群差異之下而形成的其他壓迫，這樣的行動還稱得上是因為姊妹情誼而團結的行動？組織成員主體意識與身份認同上的矛盾，會不會讓女性主義下的社會運動走回頭路？夏曉鵬（2006）指出，臺灣的女性主義者雖然普遍接受「差異政治」的修辭，但也僅止於修辭，在實際的婦女運動中鮮少落實，她以原住民女性、弱勢階級女性議題，以及女移工進入臺灣後出現的各種權益被剝奪多由勞工和教會團體發聲為例，指出臺灣的婦女團體鮮少介入。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婦女運動不涉入國族及階級議題是否為普遍現象，若以新住民／移工姊妹所參與的組織而言，她們在組織行動的過程中，是否同時存有性別意識、階級意識和國族意識，組織中的姊妹們各自認同什麼樣的身份，令人相當好奇。

認同是一種連結個體與集體的想像，任何一種社會運動都是需要集體認同的建構，因為它直接定義了行動中的「我們」是誰（何明修，2008）。女性集結的社會行動若缺乏集體認同將無法發揮作用，或許是因為相似的受壓迫意識，亦可能來自於相近的價值觀，群體成員對於某些公共事務具有共感並得以建立集體認同，然而，社會運動的集體認同並非從天而降，Gould（1995）強調，有兩個因素影響了社會運動中的認同，其一是意識型態，其二是社會關係。首先，意識型態能夠指認出導致不滿的主要社會關

係，並且將個體歸諸於所屬的群體之中。不同的意識型態相互競逐，因為他們提供不相容的世界觀，產生完全歧異的集體認同。其次，真正能夠產生行動的認同往往是附著在社會關係之中，在人們感受到真實的情境下，一群人才能進行有意義互動，強化了某一種認同所指認出來的群體之凝聚力（Gould, 1995；何明修，2008），由此看來，一群意識型態相近且具有情感連結的社會群體，是形構社會運動中的集體認同的重要因素。

然而，不管是以性別或階級為號召的社會運動，都要考慮現實層面的真實情境與問題，夏曉鵬（2005）指出，階級運動強調結構性矛盾，但忽視「意義建構」、「認同」與「情感」，在資本主義國際化的情勢下凸顯各種階級矛盾，也迫使只談認同不提物質基礎的新社會運動，面臨運動深化的侷限。也就是說，階級意識、集體認同、情感與物質基礎，在組織運動中難以兼顧時，若彼此之間的矛盾無法化解，組織工作亦將無法順利推動，但也因為個人意識型態、身分與認同的多重性，讓「姊妹情誼」的矛盾與相關議題，因其錯綜複雜關係而變得更為有趣。在文化多樣性以及現實環境的交互影響之下，唯有綜觀性別、族群、階級存有的差異、受壓迫意識與集體認同，透過理論與實務的交互激盪、討論與辯證，才能梳理出更全面的認識與理解。

肆、研究方法與資料蒐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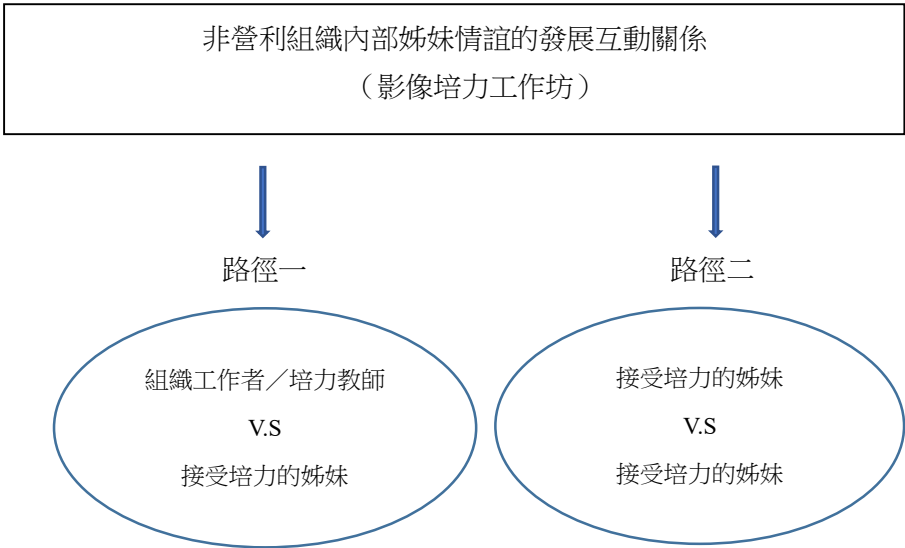
一、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鎖定 2014-2018 年曾經執行新住民／移工影像培力工作坊的 3 間非營利組織進行個案研究，藉由具執行門檻、不易完成的影像培力行動在社群成員之間的運作情形，以探究「姊妹情誼」在組織工作與任務中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功能，透過女性主義及多元文化理論觀點，觀看內部成員在性別、種族及階級差異等多元文化交織之下的發展脈絡。採質性研究方法主要是希冀能深入被研究者的經驗世界，並站在被研究者的立場、其所處的社會脈絡，以深入體會其感受和認知。本研究針對非營利組織工作者、培力教師（學習支持者），以及新住民／移工姊妹（影片作者），進行一對一深度訪談，透過不同的人際網絡路徑（如圖 2

所示)，以深入了解影像培力工作坊課程執行過程中，內部社群的互動以及情感支持系統如何運作。

其次，針對共同參與自我再現影片製作的新移民姊妹進行焦點團體訪談，期待內部社群成員的發言能喚起集體記憶，並讓受訪姊妹在相互激盪之下各抒己見，以獲取更多實質與豐富的研究資料。此外，在資料蒐集過程同時進行田野觀察，以了解社群人際關係樣貌及狀態；最後，以受訪姊妹於影像培力工作坊所產製的影音作品做為補充資料，從中認識新住民／移工姊妹的內在世界以及敘事觀點、立場與意念，訪談內容與影音文本相互對照參考。

圖 2：姊妹情誼於組織內部之發展與互動關係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有二，其一是參加影像培力工作坊的組織內部社群成員，共 11 人，包括 4 位臺灣籍學習支持者（非營利組織社工、培力教師），以及 7 位參與拍片的新住民／移工姊妹（影片作者）；其二為新住民／移工姊妹拍攝的 7 部影片，以其作為研究輔助參考資料。3 家非營利組織蒲公英、珊瑚及波羅蜜都是登記立案的協會，提供新住民或移工生活支持等相關服務，

蒲公英的服務對象為菲籍移工，珊瑚協會的服務對象包括來自中國和東南亞的外配姊妹，波羅蜜協會服務對象為東南亞外配姊妹，現今已擴展至新二代，比較特別的是蒲公英的主事社工泰莎同時身兼教會牧師職務，透過宗教信仰及教會的固定聚會凝聚菲籍移工社群。

3 家非營利組織皆屬服務性社團，招募姊妹參與拍攝影片的動機與緣由各有不同，蒲公英及珊瑚組織因為外部影音專業人士的合作邀請，共同辦理自我敘事影片工作坊，波羅蜜則是感受到社區大學影像培力工作與文化政策的風潮興起，組織內部有意投入參與，故而申請相關培力課程，欲透過影音工作坊幫姊妹們培力並書寫自己的故事。一開始包括波羅蜜以及珊瑚等組織的新住民課程，大都是以語言、食物與食譜故事、生命故事繪本做為培力課程或文化分享，亦曾發展戲劇課程，後來「升級」至影音工作坊的課程。

值得一提的是，波羅蜜協會於 2010 年首度舉辦影像培力工作坊，共有 6 位東南亞新住民姊妹參與，該協會於 2018 年再次舉辦相關活動，但組織社群內的新住民姊妹們皆表示無暇參與拍片，故而將培力對象從新住民姊妹轉至其所服務的新二代。研究者透過社工幹部招募研究對象時，首次（2010 年）參與波羅蜜協會拍片計畫的東南亞姊妹皆表示，因年代久遠已不復記憶，在主事幹部的協助之下，轉以參與第二次影像培力工作坊的越籍新二代姊妹做為研究對象。另外，蒲公英協會的菲籍女移工皆為廠工，多數參與影像工作坊的女移工已經返回母國或轉至其他地區工作，聯繫不易，研究者與其中兩三位曾經指導過的女移工長期以來均保持良好的關係且偶有聯繫，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無法親至菲律賓拜訪，改以線上訪談方式與其中一位女移工艾薇對談，研究對象如下表 1 至表 5 所示。

表 1：執行影像培力工作坊之非營利組織

協會名稱 (化名)	培力對象	參與人數	舉辦年份
蒲公英	菲籍女移工	18	2016
珊瑚	中國及東南亞新住民姊妹	5	2014 -2018
波羅蜜	東南亞新住民姊妹及新二代	4	2018

表 2：非營利組織的性質與培力目的

協會名稱	性質	影像工作坊成立目的及補助單位
蒲公英	社區型協會，以生活支持為主	受邀與影像工作者合作，以影像培力方式協助女移工書寫生命史，勞政單位補助經費
珊瑚	社區型協會，以生活支持為主	受邀與大學教師合作，以影像培力方式協助新住民姊妹取得話語權，國科會補助經費
波羅蜜	社區型協會，以生活支持為主	自發性的內部活動，受到社區大學開辦影像培力課程的影響，向文化部申請經費補助

表 3：訪談對象－臺籍學習支持者（組織工作者及培力教師）

姓名	身份	組織名稱	擔任角色
泰莎	社工員兼牧師 (熟稔 Tagalog 語)	蒲公英	生活及心理支持
小齊	大學教師	珊瑚	拍片協助為主
花花	社工員（後轉任民意代表）	珊瑚	生活及心理支持
李旋	社工員	波羅蜜	生活及拍片協助

表 4：訪談對象－接受培力者（影片作者）

姓名 (化名)	職業或身份	組織名稱	國籍	婚姻狀態
艾薇	移工	蒲公英	菲律賓	未婚
小鈴	新住民	珊瑚	中國	離婚
藍莓	新住民	珊瑚	中國	離婚
雪莉	新住民	珊瑚	中國	離婚
金枝	新住民	珊瑚	越南	在婚
桃子	新住民	珊瑚	越南	在婚
水仙	新二代	波羅蜜	越南	未婚

表 5：焦點團體訪談對象－接受培力者（影片作者）

姓名（化名）	職業或身份	組織名稱（化名）	國籍
小鈴	新住民	珊瑚	中國
藍莓	新住民	珊瑚	中國
雪莉	新住民	珊瑚	中國
金枝	新住民	珊瑚	越南

除了上述 11 位研究參與者之外，並蒐集 7 位接受訪談的新住民及移工姊妹所拍攝的影片作為研究資料，以俾相互參佐。7 部影片片長 5 至 24 分鐘不等，本研究基於研究倫理考量，組織社團名稱、人名及片名皆以代號稱之去識別化。

三、資料蒐集及資料分析

上述 11 位研究對象均接受一次的深度訪談，訪談時間 2-5 小時不等，另外，珊瑚社群的姊妹們在深度訪談之前，先進行過一次焦點團體訪談，希冀透過群體共振的方式喚起共同的經歷與記憶，焦點團體訪談時間約 2.5 小時，研究者並透過訪談過程的小團體聚會等田野現場，觀察姊妹們的相處與互動情形；針對未曾謀面的波蘿蜜成員水仙，曾於深度訪談之前進行一次大約 1 小時的預訪。本研究同時以 7 位參與研究的新住民及移工姊妹所拍攝的影片（文本）作為補充性參考資料，以提高研究資料的厚實度與效度。本研究以深度訪談（英文代號 D）為主要蒐集資料的方法，並以焦點團體訪談（英文代號 F）以及參與觀察法（英文代號 O），作為輔助方法蒐集研究資料，並蒐集姊妹們產製完成的自我再現影音文本（英文代號 T），以簡易場記進行整理。所有訪談錄音經聽打謄寫為逐字稿，作為研究分析之基礎資料，研究觀察筆記及影音場記作為補充參考資料。

四、影音文本簡介

珊瑚社團 5 位新住民的影片內容，大多聚焦在新住民姊妹的家庭與工作，透過記錄呈現個人／同鄉姊妹的生活日常與遭遇；波羅蜜社團新二代水仙與社工兼培力教師李旋討論後，決定拍攝媽媽工作的樣貌；蒲公英社團移工艾薇透過影片陳述來臺工作的原由及移工生活狀態。7 位新住民及移工姊妹的影片皆勇於透過外籍配偶、新二代或外籍勞工的身份，陳述個人的真實生活處境、經歷與心境，希望獲得臺灣民眾的尊重與理解。

表 6：影片基本資料

作者	片長	影片內容
艾薇	5 分鐘	自訴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而到臺灣工作。個性喜歡旅遊與冒險，在臺灣一有機會就會到處走走、飽覽不同的風土人情，體會大自然的偉大與美麗，剛到臺灣時因為語言不通覺得自己很笨，在工廠的工作量繁重、壓力大，自覺被當成機器人般亦曾遭不友善對待。
小鈴	24 分鐘	為了生計兼 2 份工作賺錢，需要照顧家中 3 位殘疾的老人並做大量的家事，日夜忙碌奔波只為求溫飽，丈夫長期缺席，與女兒相互依存關係緊密。
藍莓	12 分鐘	記錄身為單親媽媽與女兒相依為命的景況，影片中呈現與其他中國籍姊妹親近互動的情形，以及其工作與日常生活的樣貌。
雪莉	9 分鐘	影片前段拍攝回到中國老家與父母一起過年的影像，後段呈現被前夫持刀割破喉嚨險些喪命住在醫院多日，敘說走出生命困境的過程。
金枝	15 分鐘	自喻為海鷗，飄洋過海尋找幸福，影片呈現在臺灣與先生、兒子一家三口的自然互動，並記錄了與越南家人視

訊情感交流的溫馨片刻。

桃子 15 分鐘 拍攝自己嫁至臺灣後受到婆婆支持，有機會至民間組織學習的境遇，並記錄其他 2 位生活極為艱困的越南籍姊妹的故事，影片中雙方以越語交談，呈現同國籍姊妹從早到晚辛勤工作的刻苦與堅毅。

水仙 5 分鐘 記錄媽媽上班工作的狀態，以旁白道出其能感受擔任看護的辛勞與付出，認為母親的工作很不簡單也很有意義。

伍、「公」「私」交織：以姊妹社群連結為號召的影像培力行動

一、拍片做為一種「方法」

珊瑚社團培力教師小齊指出，拍片是為了幫助姊妹們自我了解，並產生生活方式的轉化，它是一種方法而不是最後的目的或結果，透過這個「方法」（拍片）希望讓姐妹們得以：（1）形成支持系統相互扶持（例如幫忙接送小孩）（2）看到自己的生命（3）養成另一種生活方式。波羅蜜社工李旋表示，2010 年文建會有補助社區影像的文化政策，當時認識在蘆荻社區大學教導影像培力的朋友，分享一些相關的經驗，故而思考在語文學習之外「可以跟姊妹一起做什麼」，並啟發其以相機作為一種培力的嘗試。

蒲公英社團主事社工泰莎同時身兼教會牧師的身份，參與拍片的多數移工姊妹亦會參加教會週日禮拜或固定聚會，較特別的是泰莎曾經在菲律賓待過一段時間，通曉菲律賓 Tagalog 話，使用移工的母語進行溝通，令人備感親切並獲得更大的認同，在影音專業工作者邀約之下協同開辦移工自拍工作坊，出發點是教導處於邊陲的女移工透過影片自我敘事，除了協助移工姊妹們學習簡易的影音製作與操作技術，更重要的是讓她們的主體性得以展現，非主流的聲音被聽見並獲得理解，幫助其在拍片的敘事過程中自我整理，找到與世界對話的方式。三個組織雖非倡議型社團，但有意透過課程鼓勵新住民／移工姊妹們訴說自己的生命故事以展現自我，並與社會對話。

二、受壓迫意識、自我成長需求以及姊妹社群的陪伴支持三位一體

參與拍片工作坊的姊妹主要基於 3 個因素而聚集共學，其一因具受壓迫意識而投入參與公共性事務，欲展現「我群」的聲音，其二是個人學習的需求，想要自我成長，其三是尋求情感連結與生活支持，學習過程中相互陪伴、取暖。大部份參與拍片計畫的姊妹們，學習動機與心態上三者參雜，並非僅依單一原因而加入學習門檻較高的影片製作課程，更重要的是對於組織工作者的認同與信任，成為這群姊妹們參與拍片工作坊的基本前提。艾薇、藍莓、小鈴、雪莉、桃子及水仙都曾經受到組織社工的幫助與支持，認同且信任對方，故而當社工邀約參與影像培力工作坊時，她們願意「犧牲個人的時間」投入活動。

參與拍片的新住民姊妹中，有些人在自身的婚姻中受到了壓迫，甚或受到嚴重的暴力傷害，例如雪莉，也有如同越南籍姊妹桃子雖自知「嫁得好」，但因為看到其他越籍姊妹在婚姻生活中的困境，想要學習拍片為同國籍的外配發聲與倡議。桃子說，「我想要學技術拍其他姊妹或是新二代，用鏡頭把姊妹的故事傳下去，去幫助別人，也教孩子們不要看不起媽媽。」小鈴說，把自己的故事拍出來是希望能破除外人對於中國籍陸配的偏見，「其實是想把自己的故事拍出來，可以讓大家看得到」，她表示，別人說新住民是來騙錢，大陸妹都是來做坐檯酒吧女、做別人的小三，「但我們就想讓大家知道我們嫁過來也是想要有一個幸福的生活，也想要有一個自己愛的老公，也想要讓自己的生活是正常的、美好的。」小鈴指出，姊妹們為了家庭而努力，但婚姻出現問題時常常被污名化，「其實這些問題都不是我們新住民的問題，有些是老公的問題，有些是婆婆的問題，有些是你們都不認識我們。」

小鈴與丈夫相差 20 歲，兩人相識於中國大陸，嫁到台灣後才恍然發現被當做「免費的看護」，同時要照顧家中 3 個殘疾的老人，加上先生外遇婚姻生活不美滿，身處家事勞務與工作養家的高強度生活壓力，讓她疲累不堪、睡不飽且心情十分抑鬱，曾一度想不開，因為珊瑚協會社工花花的協助，以及一同參與協會活動的新住民姊妹的陪伴，花了近十年的時間才慢慢走出生命幽谷。

我就想說我在大陸真的是只有國中畢業，什麼都沒有，這些東西都在台灣學的，電腦也是在台灣學的，慢慢地我就覺得我掌握很多的知識，就是慢慢變強大，所以現在才敢跟老公離婚！不然我那時候真的很傻，傻到家了，還跟老公說「算了，有你沒你無所謂，只要你每個月給我臺幣一千塊，我就留在你家幫你照顧老人一輩子」。

在協會就是，一是學了很多東西，二是認識很多朋友，就很多朋友很厲害啊，有的姊妹她嫁得好、生活好，她就會有些好事情就會告訴你，所以我們就自己想辦法去努力啊，所以朋友真的很重要，不然我在那個家都會變憂鬱症死掉，哈哈！（小鈴 D）

花花表示，拍片過程是一種陪伴，「然後會陪她，跟她討論」，她說，拍片即是生活上的延伸，因為姊妹們的日常生活還是一直在走，包括家庭的衝突、離婚和家暴，「像雪莉那個案件，中間又碰到被傷害啊，那這個過程我們都要陪，就是一直陪、一直陪，然後她還有勇氣再把它做完，那就很不容易欸。」

菲籍移工艾薇受到泰莎的積極鼓勵而參加活動，而她本身樂於學習新事物，希望透過自我敘事影片傳達移工的心聲，讓更多臺灣人認識與了解移工。艾薇表示，為了幫助父母改善家境而來臺工作，日常生活中常遇到不友善的臺灣人，工作上的壓力也很大，拍攝自我敘事影片讓她有機會回頭看看自己，也因為加入拍片計畫，讓她跟同一組的珍蒂、裘依三人培養濃厚的姊妹情誼，「當學習過程遇到挫折的時間，我們會互相鼓勵，彼此加油打氣，也會互相幫忙對方。因為一起拍片，我們的感情變得比以前還要好。」艾薇在新冠疫情嚴峻時曾返回菲律賓，並於 2022 年底再度來臺，至今仍與當時一起拍片的珍蒂、裘依保持聯繫。

參與波羅蜜社群影像培力課程的新二代水仙表示，媽媽從越南來臺工作，後來嫁給臺灣人成為新住民，水仙在 2015 年讀完國二的時候，從越南來臺灣依親，母親安排她至協會課輔、參與活動，因為母女均受到協會的

諸多幫助，當社工李旋有意開辦拍片課程時，一來是自己對影像活動感興趣，二來想要「還人情」，進而加入影像培力工作坊。

我媽媽就跟我說，當初妳來臺灣，就是她們教妳學中文，妳就是在那邊，人家幫我照顧妳。現在協會有什麼事情，妳可以幫忙，妳就要去幫忙。**我們其實就是欠她們一個人情。**……現在協會如果需要什麼，我可以站出來我就出來。那時候阿姨（李旋）跟我說她們有這個計畫，然後就叫我來上課，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自己對這件事情感興趣，所以就參加了。（水仙 D）

熱愛學習的金枝表示，拍紀錄片是自己的一個妄想，對她來說非常困難，但因為喜歡學習新事物，所以參加了拍片課程。一開始完全不會使用電腦，連滑鼠的左鍵右鍵都搞不清楚，一點一滴慢慢學習，到後來剪片時近乎廢寢忘食，對於人人畏懼覺得非常困難的後製剪輯工作，金枝表示感受到剪接的魔力且樂在其中，「剪接好像它拉我進去，它就沒辦法放我出來」：

那時候六點還是六點半，老公打電話問「在哪裡？」我說「我在這邊剪片啊，還沒好啦！不要再打來了！」……然後我就說為什麼我要煮飯，我說我還沒好怎麼煮？！……然後我就說，好啦，等一下，等一下要給我弄好才能回去啊！然後回去就兩個不講話。（金枝 D）

金枝笑稱，有一段時間因過度投入剪接，「認真到好像把小孩老公丟掉了」，幸運的是金枝婚姻生活美滿，獲得先生的支持得以學習新事物，未受到拘束或限制。

三、私人情誼的情義相挺是促成組織行動的重要前提

學習門檻較高的拍片工作坊得以進行並完成，主要原因是組織社工多年的耕耘，提供社群成員充分的生活支持與幫助，獲得姊妹們的認同與信任，也就是說，拍片工作坊是以長期累積的私人情誼為基礎而得以開辦的組織工作，這也說明了為何當初研究者想要透過自身力量開設移工影像培

力課程，製作越語、印尼語及英語文宣廣發卻無人報名，最後透過專門服務移工的蒲公英社團的協助始招募到移工學員，可見社服組織與服務對象的社群連結力不容小覷。

珊瑚社團志工花花表示移民服務工作就是「用生命去陪她」，革命情感的培養是建立在「長期的陪伴蹲點，並交換生命的經驗。」花花指出，自己本就從社工角色進一步跟新住民發展成姊妹關係，公領域、私領域之間的關係也是交織前行，在公私交織的「網」下，許多公共性的議題得以推進。「支撐大家一起往公共目標前進的話，就是私人情感的交陪啊，……簡單來講就是說，她在臺灣的生命，有我的參與。」小齊指出，雖然她個人有私心，希望影片可以完成，因此工作坊一走就花了 5 年時間，但她和花花真正在意的是這個過程的相互陪伴，「我覺得這整個計畫，每一個參與的人其實都是用陪伴者的角色，就是互相陪伴。……我們陪伴她們，她們也陪伴我們。」小齊表示，課程成為小鈴生活中很重要的重心，「它就是一個有點像是你其實就三不五時，你可能想要跟你的閨蜜碰個面這樣子，所以沒有什麼理由不來。然後來了也很好啊。」她說，雖然姊妹們知道要拍片，「可是來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個放鬆、一個舒緩、一個療癒，就是下班後然後大家聚會，然後吃吃喝喝。」小齊補充，「我都跟花花開玩笑說其實我們都沒有在上課，我們都在聊天，可是我們也都知道這個聊天其實是課可以上下去的重點。」（小齊 D）

蒲公英社團的社工兼牧師泰莎是工作坊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靈魂人物，三個月的拍片期，時常給予移工姊妹們心理支持，不斷鼓勵她們堅持下去，菲籍移工艾薇在影片完成的公開發表會上，曾經公開說道，拍片的過程很辛苦，曾經想要放棄，但還是努力撐下來了，「因為我想要讓媽媽感到驕傲（make Mama proud）」，而她口中的媽媽是指社工泰莎，菲籍移工姊妹私下稱她是「臺灣的媽媽」。除了社工的陪伴之外，姊妹學員相聚一堂也是參與活動課程極為重要的動力，如同小鈴所說，上課讓她想到又有好朋友聚會，互相訴苦，「不要管它課不課，只要能聚在一起大家都很願意抽出時間來，都很高興，我們的動力就是這個。」（小鈴 F）珊瑚組織希望透過拍片的過程讓姊妹們形成自己的支持系統，因為新住民姊妹們的支持系統就是夫家和社工，若夫家無法支持的時候只剩下社工，但社工又分身乏術時，姊妹

自己的支持系統可以彌補社工系統的不足。

3 個組織一開始招募的培力對象，大多能走到最後並完成作品，但仍有少數例外，珊瑚社團有 1 位印尼籍新住民因為夫家的家人，尤其是大姑及小姑極力反對，認為「學那些技能會被帶壞」而被迫中斷拍片，蒲公英社團原先有 20 位菲籍移工參加工作坊，其中有 2 位因工作的關係於前期退出計畫。所有受訪的學習者跟培力者一致表示，影音工作坊一路走來相當辛苦，執行難度極高。李旋指出，「你就會發現說，這個其實還是有器材的門檻，還有剪接的門檻，我個人覺得最恐怖的還是剪接的門檻。」多數新住民及移工姊妹表示中途曾經想要放棄，但最終還是完成了影片，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讓組織內部的社工及培力教師失望。小鈴表示，看到老師遠道而來且這麼辛苦，自己不拍「會對不起老師」，金枝亦曾說過「我覺得老師很專業，很瞭解新住民。」學員們感受到老師的認真付出以及學習支持系統提供的多方面支持，不忍辜負，再加上社工員在一旁不時加油打氣、提供精神上的支持，社群形成一股凝聚力，終而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陸、多元文化交織下的姊妹情誼與自我認同

一、姊妹情誼下的國籍（族）意識與認同：身份、文化、語言及生活習慣是影響因子

珊瑚社團所服務的姊妹們，早先透過食物餐飲以及其他課程的學習而相識，但當時感情緊密度不高，培力教師小齊表示，藍莓與小鈴原本不太熟悉，參與拍片工作坊時發現可以互相幫忙接小孩，生活上彼此照應而變得熟稔，就生活圈的交流上而言，「確實就是會跟同鄉比較好」。至於姊妹與姊妹之間的姊妹情誼以及姊妹與學習支持者之間的姊妹情誼，小齊指出，金枝跟桃子可以講越南話，相同國籍確實比較容易產生姊妹情誼，她補充表示，「藍莓跟小鈴，姊妹情誼就會很強，桃子跟金枝就很強，那當然就她們跟花花，相較於她們跟我，其實又會有程度上的不同，所以我覺得會有（姊妹情誼），但是程度不同，跟狀態不同。」

焦點團體訪談時藍莓跟小鈴皆表示喜歡跟同為中國籍的姊妹一起拍片，藍莓說，如果跟一般臺灣人一起拍片的話，不會把心裡的話告訴對方，但

跟中國籍姊妹就不一樣了。

比方說現在我們是跟臺灣人一起拍片的話，那拍兩天也不會學會什麼，但是跟我們自己大陸姊妹來拍的話，就會有動力就會去，為什麼？就是因為大家來這邊都是有自己的經驗，都差不多可以訴說自己的心中的不愉快、不開心的事，就比較有安全感，會去那邊、想去那邊。跟臺灣人或跟另外的人，因為不同的國，……不同地方的文化不一樣，然後背景跟條件不一樣，那我們就不會把心裡話跟她訴說啊，所以說妳去了就沒有意思，就是這樣，所以說喜歡跟姊妹的原因就是這裡。（藍莓 F）

小鈴在一旁附和藍莓表示姊妹們相識十多年，彼此十分熟悉，「就是我知道她的所有故事，她知道我所有的故事，我們就沒有秘密了，我們就可以很放開地一起聊天、一起學習，就覺得很好。」

不同國籍的新住民姊妹，也會因為同為外配的身份，更容易相互理解進而培養出姊妹情誼。小鈴以自身經驗為例，表示因為喜愛跳舞，即便工作再忙再累，一直以來持續參加肚皮舞課程，雖然接觸到的都是女性學伴，但是去學習舞蹈課跟學習拍片課程，心態上並不一樣。

去花花這邊上這個課，會覺得更親切，因為這邊的姊妹我們會覺得像自己的好姊妹一樣，但那邊（肚皮舞課）只是臺灣的朋友，不是臺灣的親人，它不一樣，還是有一段距離，還沒達到那麼親密的關係。（小鈴 D）

小鈴表示，因為同為新住民的身份，雖然不是來自一個國家，但都是「外面嫁來的」，同樣要學習適應臺灣的生活，「我們有同樣的目標，然後我們才會有同樣的話題。」她補充說，新住民姊妹們因身份相同，比較能相互理解，感受上更為親切，比較放心且無話不聊，如果跟臺灣的那群媽媽在一起，心境上不一樣，「因為她們不了解我的生活，她們不知道我們嫁來的辛苦」，小鈴說，「所以我們跟她們聊，我怕她們不理解，所以會有一些距離，不能聊得那麼親密」。新二代水仙表示，拍片過程跟著其他新二代一起學習，其中有一位越南籍弟弟因為剛來臺灣不久，中文還不太好，需

要由水仙幫忙充當翻譯，同為越南人比較有話聊也比較親近，「可能臺灣人他們都會比較懂一些，然後他們不會來跟我們討論要怎樣，他們就自己（去拍）」，水仙補充說道，幾個新二代互相幫忙，「我們互相拍，還蠻快樂，還蠻開心的，相處很好啦！」。

曾在菲律賓生活及傳教數年的泰莎以生活習慣上的差異為例，她說菲律賓人很喜歡肢體接觸「你知道個人的 *hygiene* 是非常重要的，她們是那種一定要洗頭洗澡，每天都要把自己弄得香香的，因為她們要抱來抱去。」她表示，有時候碰到載移工姊妹的司機都會問「為什麼她們頭髮都沒有吹就出來？」泰莎接著說，一般臺灣人會覺得哪有每天要洗得濕答答出來，「她們（菲律賓人）要讓人家看見她們都有乾淨地出來，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說我剛洗完澡出來。」如同泰莎所言，生活習慣及文化上的差異，影響人們對於人事物的理解與認同。

當問及拍片學習歷程十分艱難，憑藉什麼讓姊妹們聚在一塊沒有散開，泰莎表示是出自於「關係」、「關係是一切」，她表示花時間長期經營就會有回饋，並自陳身為牧師有其身份上的優勢，能獲得姊妹們的基本尊重，「就是跟平常交朋友一樣，妳真心對待她們，她們就是會回饋妳對她們的關心。」泰莎說，「上帝把我放在這個群屬裡面，我就是喜歡她們，她們也願意配合我，我很感恩這件事情。」除了信仰之外，語言的加持讓蒲公英社團成員得以緊密相連，泰莎指出，「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講她們的語言啊」，她說，即便移工姊妹們還是視她為外國人，但起碼她在溝通上比較自如，「因為我可以講她們的語言，妳語言不通就吃虧很多。」

究竟國族差異如何跨越？泰莎表示除了長時間的陪伴與支持之外，「妳真心接納她們，那條線就會變很模糊。」然而，泰莎也承認國族差異的隔閡不容易跨越，即便可以講一口流利的 *Tagalog*，姊妹們還是把她視為外國人，對此，花花亦有相同的感受，她認為姊妹們的感情再好，國籍、語言及文化取向的差異，是影響情感連結度的重要因素，也許日常見面都是朋友，但是私下較有往來的還是地緣、文化上近似的姐妹，因為國族或文化上的隔閡，難免會處於「妳講的話講不到我心裡」的狀態，這個現象來自於共同（或近似）的成長經驗、價值養成等，花花稱之為「原生文化」，並坦承「族群（國族）的親近性很難突破」。

二、姊妹情誼下的階級意識與認同：資源分享可減輕階級矛盾並提升社群認同感

身份、地位、財富、勞動形式、生活方式的差異，都能形成不同的社會階級群體，菲籍移工姊妹們在母國的家庭背景與社經地位或有差異，然在臺期間皆擔任工廠作業員，同為勞工階級，她們以作品訴說身為母親、女兒以及妻子等多重角色的責任與義務，以及為家庭的付出與犧牲，透過文本展現其性別、階級意識與集體認同。就移工姊妹與學習支持者之間的階級議題而言，蒲公英協會社工泰莎兼具牧師的身份，因而受到移工姊妹的尊敬，研究者於田野觀察，泰莎與移工姊妹的日常相處與互動親密，並未因階級身份上的不同而影響組織內部的集體認同。

相較於移工姊妹社群，新住民姊妹彼此之間、以及新住民姊妹與組織社工及培力教師之間，現實生活中存有某種程度上的階級差異，主要在社經地位的差別。在大學任教的小齊提及，為了獲得新住民姊妹的認同，她曾在戲劇課程中分享自己在國外留學時，人生地不熟及語言溝通不良的辛苦經驗，想要強調自己可以同理移民姊妹的處境，但當場有姊妹說「妳那個跟我們不一樣」，小齊直言「被打醒」，「我就會想要假裝那個差異不存在，想要刻意地去……好像跟她們一樣」，然而彼此確實不一樣，她說，「我再怎麼辛苦，相對於她們，我的資源絕對是比她們還要多。」小齊表示，刻意假裝差異不存在反而很奇怪，後來就接受差異，接受姊妹們看待她身為大學教授的方式，並用這個方式與她們交朋友，小齊說，跨越差異的要點是先接受自己在身份、生活經驗上與新住民姊妹的差距，接受後真誠交流，「不要假裝或以為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新住民姊妹們於焦點團體訪談中皆表示很感謝小齊老師的陪伴與教導，影片完成後幾度帶著姊妹們出席映後座談，藍莓說被公開介紹為「導演」備感殊榮，有機會搭高鐵到外地跟不同的觀眾對話，是難得的生命經驗，她並稱小齊老師是「響叮噠的人物」，表露出對於培力教師的認同感，彼此之間未因階級差異而影響情誼。

與珊瑚社團新住民姊妹的談話中，較為明顯出現的關鍵字是「誰嫁得比較好」，而所謂嫁得好除了指婚姻生活美滿之外，更顯著的意涵是指夫家經濟條件較佳。參與拍片的 3 位中國籍姊妹的婚姻皆以離婚收場，經濟條

件並不寬裕且需獨立扶養小孩，有些姊妹一人身兼 3 份工作，終年勞碌奔波，相較之下，夫家經營民宿的越南籍姊妹桃子，是這群新住民姊妹口中「嫁得好」的代表，然而，就社群成員互動的觀察與深度訪談來看，小鈴、藍莓及雪莉等人並不會因為桃子的夫家經濟條件相對優渥而與其產生距離。小鈴指出，桃子不僅幫助越南姊妹，也會幫助其他國籍的外配，提供多元的資源與援助，例如通知姊妹們「我有越南食品，妳們姊妹誰要都過來拿。」小鈴說，「就是我覺得她自己嫁得好，然後她也不會嫌我們貧窮，有點看不起或什麼」，小鈴表示桃子跟姊妹們很親近，「然後又對我們特別地好，所以我們跟她就是沒有國籍之分，好姊妹的關係，好朋友的關係。」

小鈴、藍莓及雪莉等人脫離婚姻帶著小孩獨自生活，最大的願望就是買房子，努力工作存錢，希望擁有自己的家，3 位失婚的中國籍姊妹在言談之中，對於夫家有 2 棟房產並經營民宿的桃子相當羨慕，然而 3 位中國籍姊妹並未因為經濟條件上的差異，而與桃子產生我／她之別，主要是桃子對於生活上較為弱勢的新住民姊妹熱心相助，包括協助忙碌於工作的姊妹接送小孩或提供課後輔導，其民宿如同托育集中定點，提供新二代免費語言學習課程，甚或無條件收購小鈴結束市場擺攤的庫存食品，再免費提供給有需要的新住民姊妹，給予物質上的資助。越南籍姊妹金枝家境小康，當其造訪桃子的民宿時，隨即打開話匣子聊起了種在庭院的家鄉植物並分享生活大小事，兩人之間的互動自然而親切。

本個案姊妹們雖具階級意識，但並未因階級上的差異而影響姊妹情誼的發展，可能是因為內部成員樂意分享資源，物質基礎獲得某種程度的支持，減輕社群內的階級矛盾，此外，拍片的姊妹社群成員中雖有經濟壓力沈重如小鈴、藍莓與雪莉，以及小康家庭者如金枝，以及家境較為優渥的桃子，但如同小鈴所說，遇到難關時靠經濟條件好的姊妹適時援助，「其他自己想辦法努力」，中國籍姊妹們多年辛勤工作並積極儲蓄償還房貸，已逐步改善生活。部份影音文本雖呈現姊妹們艱辛的生活狀態，例如居住環境不佳、從早到晚勞碌奔波工作，但新住民姊妹並未對於階級議題多加討論或有所批判，對她們而言，姊妹情誼下的集體認同，除了共同身為母親、女兒或妻子的女性角色之外，亦是基於彼此都是外配或客工的身份認同，現實生活的階級差異並未直接影響姊妹情誼的發展、內部社群的認同與情

感凝聚，亦沒有造成明顯的我／她區別。

柒、姊妹情誼的願景與限制

一、姊妹情誼的發展與願景

（一）個人認同與集體認同的建立與延伸

參與計畫的姊妹們是社工長期陪伴的對象，小鈴在焦點團體訪談時表示，「我們把花花當成我們的家人」，單一主體與社群連結之後產生了集體認同，因為看到了行動的意義與價值，促成姊妹們全力以赴參與組織行動。身為學習支持者，花花提到自己在工作坊的任務是穩定姊妹們的心，適時給予鼓勵與督促，同時將主體還給工作坊的姊妹們，她認為這是姊妹們的本能被喚醒，對公共性議題產生責任，期望透過自己的生命敘事影片來發揮更大的效益。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其實我們也做了很多討論嘛，包含這是對自己的移民經驗有某種整理，而且妳可以透過影像來做，妳要讓別人聽到妳的故事。我覺得這個對她們來講已經是超過她想要用這個時間來打工賺錢的那種期待了，她就是更想做這件事，她覺得這件事情重要，……包括探索自己的移民的價值，她們如果覺得這件事情重要，她就會排除萬難，但是如果她覺得賺錢比較重要，就不會來了啊。

我覺得經濟問題當然有……有很多人都會有經濟壓力啊，藍莓也有經濟壓力，雪莉也有，小鈴也有啊，但是為什麼她們留下來？就是因為她們不怕辛苦。（花花 D）

小鈴表示，學拍片跟學習其他的課程不一樣，因為有共同的目標，藍莓附和表示，老師們大老遠來幫我們上課，很辛苦很認真，「看到別人還在堅持，我們也要堅持，冬天很冷又下雨，還是會過去上課。」除了很開心跟姊妹們見面之外，也因為大家已經有了革命感情和共同目標。越南籍姊妹桃子在擔任志工階段認識花花，非常佩服她無私付出的精神，因此持續追隨花花，與她一起奔走、服務新住民姊妹，桃子因為認同花花及老師所

說「用鏡頭把姊妹們的故事傳下去」而參與珊瑚社團的拍片工作坊，在學習的過程中，因為花花的鼓勵而決定擴展拍片計畫，後來獲文化部的補助，持續拍攝並將影片紀錄的觸角擴及其他越南籍新住民姊妹。現在的桃子早已獨當一面，儼然成為姊妹們資源集散與轉介者，因懂得資源串連與共享，成為在地姊妹的重要支持者，疫情期間，桃子透過網路將新住民姊妹的服務與文化教育推廣工作，藉由線上課程推廣得更深遠，已有一番成績。值得一提的是，影像培力課程告一段落後，花花亦離開社工圈投入民意代表選舉，積極於社會參與，小鈴等姊妹一路陪伴與支持，並義務到校園門口與馬路口舉牌，努力為花花輔選。社群姊妹在私人情誼的基礎之下，因有共同的目標與願景，故而挺身投入為公共事務以及社會倡議而努力。

（二）增進彼此的認識與理解並加深社群凝聚力

來自北越的金枝說，一個人學習可能會害怕，因為對陌生的事物有所擔心，跟著姊妹們一起學習，大家互相幫忙，互相關心，不只姐妹之間沒有隔閡，與教學團隊之間也「像朋友」，沒有國籍之別，氣氛輕鬆，她說，處理影片時若有些中文不清楚，可以問中國籍外配藍莓。而藍莓則笑著說在後製剪接時，她都稱金枝為老師，剪接技術上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說「金枝老師，拜託妳了！」，後製階段姊妹們輪流排班使用電腦，有諸多的交流與互動，彼此互相幫助，她們不僅是學習者也成為學習支持者。菲籍移工艾薇表示，外拍時姊妹們會彼此幫忙拍攝，後製階段雖然有影音助理幫忙，但那是最艱辛的一段時間，到了工作坊的後期，因為老師（亦即研究者）覺得她拍攝的畫面還不夠多，需要刪減部份的旁白稿，當下心裡有點沮喪，加上平時工作壓力大，曾經想要放棄，但除了老師、泰莎的鼓勵之外，更難得的是另兩位菲籍學伴喬伊和珍蒂總是在她的身旁，不斷為她加油打氣，她說，其實姊妹們在工作坊的不同時段，各自都曾面臨過低潮期，她們互相鼓勵、相互扶持，希望一起走到最後，看到影片完成她實在很開心，很有成就感，也覺得當初撐下來是正確的決定，才有機會透過影片跟臺灣人、菲律賓家人以及其他朋友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新二代水仙參與波羅蜜社團的影像培力課程時，因為對於「拍自己」感到害羞，在社工李旋建議之下轉而拍攝自己的媽媽，後獲擔任居家照護

員的媽媽以及照顧對象的首肯，得以記錄媽媽擔任照護員的工作樣貌，水仙表示很高興有機會拍片，對於媽媽的工作有了更多的認識，感受到其中的辛苦，並跟越南的家人分享母親在臺灣為了養家的辛勞付出。

因為我自己也不了解媽媽到底在做什麼，然後後面去看，才知道媽媽真的好厲害，她能這樣做，我真的覺得不能想像，我一開始是覺得，只是去照顧阿嬤，她陪陪聊天或者是什麼而已，我沒想到還有做這麼多的工作。然後覺得真的很好，因為有時候跟媽媽聊天，她也不會跟我講說她在做什麼，但是如果能藉由這個拍影片，知道媽媽到底在做什麼，她不用跟我講，她就做，我們就拍，然後我們就會自己知道到底這是在做什麼。覺得還好有去參加這個活動，這個計畫，然後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之前都不知道。每次跟我大阿姨就是在越南，還有舅舅那邊講的話，我都會跟他們說我媽媽原來工作這麼辛苦。因為其實他們也不知道我媽媽在幹嘛、做什麼，因為我媽不會講啊，她不會講在做什麼。(水仙 D)

金枝拍攝影片的過程中，在越南的父親生病了，她說原本想等拿到臺灣身份證後回越南探望父親，但終究來不及見最後一面，她將這些情節呈現在影片裡，小鈴在焦點團體訪談時表示「金枝的（影片）太好看了」，並說「真的好想要一直看！好感動，我每次看到金枝的影片我都會流眼淚。」艾薇亦提及，看到工作坊其他姊妹的影片才知道那些不為人知的一面，「例如有位姊妹單親媽媽的生命故事，我和在菲律賓的家人看到（影片）都哭了」。新住民及移工自我再現影片提供外人觀看其生命故事的窗口，蒲公英社團社工泰莎說，即便事隔數年，每次重看姊妹們完成的影片還是不由自主地很感動，「想起那個整個過程，覺得很不可思議。」她說，姊妹們用自己的視角來說自己的故事，「我覺得那個 idea 真的很棒啊！我們辦活動時候會放（影片），很有趣啊。」

二、姊妹情誼的限制

（一）私領域的姊妹情誼不易轉為公共議題的參與

對組織而言，社會行動實踐意涵的姊妹情誼，期待建立在公共性的理念認同之下，以對抗強大的父權壓迫而團結，然而，當參與培力的邊陲者的受壓迫感不深，或是對於公共議題的關注度較低時，公共參與意識不易被喚起，在此時，姊妹情誼的凝聚力很難轉移到公共性議題的理念認同。花花認為需要先有私人情感的交陪才能支撐大家一起往公共目標前進，她覺得公私是交織而行，「如果沒有私人情感的交陪，我覺得她也沒有辦法跟你討論公共議題，或者是更多的事情。」花花表示「公私交織就是一個『網』，它會比較牢固。」然而花花也坦承，有公共意識的人本就不多，社群中的姊妹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常常是因為私領域的關係與情誼所牽引。

泰莎說，菲律賓人是講關係的族群，影像培力工作坊課程執行及結束後，移工姊妹們在教會做見證時都說，若不是泰莎的話，她們根本都不要來。花花亦曾指出，社群成員對於公共議題的參與是以私人情感做為支撐，這些說法顯示出即便是與自身權益相關的性別或族群議題，新住民／移工姊妹很難基於公共議題的關注與討論而凝聚，並轉化為行動，反而是因為人情與關係而參與組織活動，只有少數幾位學員如桃子，一開始即是以公共性的角度思考拍片行動的意義。小鈴曾經表示「花花是我的，她是我所認識最好的臺灣人，我覺得她就像是包青天」，自從花花轉任民意代表不再擔任社工，小鈴曾經數次提及，「花花現在是大家的，我實在很捨不得跟別人分享這麼好的花花，她現在都沒有時間陪我們了。」對於姊妹們來說，私領域的情感交流與陪伴是她們最在意的事。

組織內部社工需要與姊妹們建立深厚的情誼，透過私領域的「交陪」，涉及公眾事務有關的組織工作才有辦法推動，這也說明了集體性的性別意識、性別認同與團結力，對於組織工作者來說恐怕存在著模糊抽象的想像。波羅蜜社工李旋提及在繳交影片時，被審查委員評為影片缺乏社會意義，這反應了部份姊妹們於拍片過程不見得有強烈的受壓迫意識，抑或是想要透過影片進行公共對話的意識，然而，就多元文化精神來看，任何生命故事都值得被看見，看似輕描淡寫的生命際遇亦能反映個人在族群及文化差異之下的立場與觀點，幫助相互理解與尊重，就女性主義「個人即政治」論點而言，若能透過個人故事引領觀眾覺察結構性的社會壓迫，進而關注相關政策，則有助提升自我再現影片工作坊的公共性意涵。

（二）協會與成員之間的姊妹情誼難以長久維繫並面臨轉型

花花坦言，姊妹們是為了生存才來協會找資源，在本世紀初臺灣新住民婚姻人數達到高峰的 10 年間，社團提供了諸多的生活支持與學習支持，然而，隨著時代的進步，資訊更公開、外在的條件與環境更為友善，法規更加完備，「孩子快唸大學，那她還怕什麼？她以前忍耐的那個辛苦……台灣的法令不友善，逐一沒有了。」姊妹們的資源增加，手機普及，加上來臺較久的資深移民姊妹可以母語跟新來的姊妹交談並提供協助，有各種的工具跟管道，「自己形成自己的圈圈，發展她們的情誼，我們的角色也就差不多了。」花花一語道破目前臺灣服務東南亞新住民組織的現實處境，「在新移民的服務裡，臺灣人遲早要退場」。她同時指出，「在不缺資源的情況下，很多人就疏離，最後選擇留下來的，都是想法、觀念相近的姊妹」。

波羅蜜社工李旋指出同樣的遭遇，「姊妹們都有個人生活，而且現在她們都有能力去解決自己的事情，所以現在很少人會去協會要求幫忙」。新二代水仙表示，她剛到臺灣的時候，波羅蜜協會裡的人很多，活動很多，一直在辦活動，自己也學會了很多事，後來因為到學校讀書，很少到協會，也不知道協會長怎樣，後面才發現若要辦活動都只有幾個人可以參加，「在協會的人愈來愈少，辦公室的人也慢慢沒有做了」。艾薇在拍片計畫結束一年後，減少了上教會的次數，與泰莎之間雖仍有情誼，但關係連結度減弱。從這些案例來看，社工需要花長時間建立與新住民及移工之間的姊妹情誼，然而，社群內部關係的維持並不容易，隨著時間推移，姊妹們因為擁有較多的資源，或是生活現狀產生變化，而與組織內部的社工們漸行漸遠。

除了花花轉換跑道擔任民意代表之外，原先以服務菲律賓移工為主要工作目標的蒲公英協會社工泰莎，現今改以服務菲律賓跨國婚姻家庭為主，2016 年拍片時期在教會出入的眾多移工姊妹，大多已經回國甚或失聯。波羅蜜社團李旋表示，新住民姊妹現在可以靠手機以及越籍姊妹圈的資訊而獲得生活支持，因應時代變化與趨勢，該協會轉而以服務新二代為主，社工及志工的人數也減少許多。研究者與當初教導拍片的 6 位移工姊妹中的少數幾位仍偶有聯絡，但唯一持續聯絡的僅有艾薇，主要是兩人志趣與個性上較為相投，反觀珊瑚社團志工花花的情況亦是如此，現今與她仍保持

聯絡的新移民姊妹，多為當時留下來參與影像培力課程的姊妹。

捌、結論

本個案之非營利組織雖不屬於倡議型社團，然而對於社會議題亦相當關注，故而願意投入舉辦具挑戰性及困難度的影像培力工作坊，希冀幫助姊妹們在課程與行動的過程中自我培力，並能透過文本與社會對話。事實上，拍片行動不只是一種自我言說、自我創作的歷程，同時具有社會參與的公共性意涵，就本個案的多數影音文本而言，確能看到參與培力者在女性及移民／工的雙重身份之下所呈現的女性角色與形象，陳述生活中遭遇的困境、為家人的努力付出，或是對於未來的期待，並讓觀眾感受鏡頭下移民／工姊妹的堅韌精神及毅力，此一行動本身已經達到女性主義者所主張「在男流的父權社會中凸顯女性的主體性」（夏曉鵑，2006）的目的。然而，本研究的新住民／移工姊妹的性別意識與族群意識同時並存，面對性別、國族與階級差異下的多重身份，個人的主體性與集體認同的多元交織性不言而喻。

從研究結果來看，「公共議題的認同」以及「個人學習需求」是新住民及移工姊妹參與影像培力計畫的主要原因，但有趣的是，「姊妹情誼」的情義相挺是多數新住民／移工姊妹願意完成影片的重要前提，顯示出組織社群內部成員的姊妹情誼具有不可低估的凝聚力與行動力，但也反應出姊妹情誼在「反抗父權體制壓迫」的集體行動與集體認同上的限制。本研究希冀正視差異之下女性主義性別認同所面臨的挑戰，研究結果顯示，跨國籍姊妹情誼建立於長期的陪伴與生活支持，其乃組織工作得以推動的重要因素，然而它並非鐵板一塊，亦非組織工作推動的萬靈丹，就現實面向來看，不同國族（國籍）的姊妹若要跨越邊界並建立深厚的姊妹情誼，**需要共同經歷某些生命中的重大事件**，例如因反抗「共同的敵人」而凝聚，對抗的對象可能是公部門、夫家或資本家，抑或是如同影像培力工作坊拍片執行過程遭遇諸多困難與挑戰，深化了姊妹之間以及姊妹們與女性培力者之間的革命情感，這些經歷讓社群內部成員因共同的理念與價值而團結，轉化為具體的社會行動參與，並在公與私領域的交織之下共同前進。

本研究從本土案例出發，某種程度上呼應了 hooks 的觀點，她曾批評

婦女解放論者召喚的姊妹情誼的視野，是基於共同壓迫意識（the idea of common oppression），然而所謂的「共同壓迫」乃是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自以為，掩飾並蒙蔽了婦女多樣與複雜的社會真實的本質（hooks, 2015:43），hooks 認為若不考慮彼此之間的多樣與複雜性，難以建立基於性別認同的姊妹情誼。就多元文化交織性而言，以性別為號召的「姊妹情誼」雖能在受壓迫女性內部團結上發揮作用，但當性別的「同」對照國籍（族）的「異」，新住民及移工姊妹的國籍（族）意識高於性別意識，語言、文化背景及生活習慣的差異應是影響主因；新住民／移工姊妹雖具有階級意識，但她們的階級認同及「勞動階級被剝奪感」並不明顯，當姊妹們樂於分享資源時，階級矛盾可望獲得化解，階級差異並未明顯造成內部成員之間的我／她區別；當組織行動號召姊妹們團結凝聚時，除了情感基礎的奠基，「物質基礎」的需求與援助亦不可忽視，這也呼應以性別認同為號召的社會行動無法只談理念而不食人間煙火，如同 Young 所言應正視所有被壓迫的邊緣群體的差異需求。

就本個案而言，女性新移民／移工在自我再現影片製作的社會行動參與過程，面臨了多重身份認同與選擇，包括東南亞新住民姊妹對應中國籍新住民姊妹、臺灣籍培力者對應新住民姊妹、東南亞菲籍移工姊妹族群之間、臺灣籍培力者對應菲籍移工姊妹，在國籍差異及文化差異的影響之下，女性主義者高喊女性之間「政治性的團結」確實面臨不小的挑戰；此外，因為夫家反對而無法參與影像培力課程的印尼籍姊妹，反映出無法現身為自己說話的隱性受壓迫者的存在，以及姊妹情誼於社會行動的現實處境與限制。總結而言，私人「交陪」下的姊妹情誼若沒有重大生命事件的催化，不易轉移並發展為具公共性、解放意涵的姊妹情誼，但若缺乏私領域姊妹情誼的支撐，具公共性、社會運動性的姊妹情誼亦無法產生。

參考文獻

- 王君琦（2018）。〈再思自我再現做為培力的方法：以花蓮新移民女性紀錄影像工作坊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42，1-37。doi: 10.6255/JWGS.201806(42).01
- 方雅慧、何青蓉（2015）。〈高雄市社區大學推動網絡連結的機會與困境〉，《成人及終身教育學刊》，25，37-78。
- 成露茜（2009）。〈另類的媒體實踐〉，成露茜、羅曉南編，《批判的媒體識讀》，頁 371-387。臺北：正中。
- 何明修（2008）。〈沒有階級認同的勞工運動：台灣的自主工會與兄弟義氣的極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2，49-91。doi: 10.29816/TARQSS.200812.0002
- 李臺芳（1996）。《女性電影理論》。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林津如、王介言、吳紹文（2005 年 12 月 9-10 日）。〈新移民女性之組織工作：一個跨領域的實踐嘗試〉【論文發表】。「第二屆「跨界流離」國際學術研討會：公民身份、認同與反抗」，臺北市，臺灣。
- 柯婉青（2015）。〈從壓迫到解放：南洋新移民女性自拍影片的反再現與實踐〉，《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5（1），89-131。doi: 10.3966/168020042015061501003
- 柯婉青（2019）。〈批判識讀教育融入影像培力教學：一個東南亞移工自拍影片工作坊的實踐與省思〉，《教育研究集刊》，65（4），37-73。doi:10.3966/102887082019126504002
- 夏曉鵬（2005）。《尋找光明。不要叫我外籍新娘》。臺北市：左岸文化。
- 夏曉鵬（2006）。〈新移民運動的形成—差異政治、主體化與社會性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61，1-71。doi: 10.29816/TARQSS.200603.0001
- 梁莉芳（2000）。〈田野中的反思——姊妹情誼力量大？〉，《婦女與兩性研究通訊》，56，32-34。doi:10.6256/FWGS.2000.56.32
- 陳昭如（2013）。〈還是不平等—婦運修法改造父權家庭的困境與未竟之業〉，《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3，119-169。doi:10.6255/JWGS.2013.33.119

- 游美惠 (2011)。〈姊妹情誼〉，《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5，93-95。doi: 10.6486/GEEQ.201107.0051
- 藍佩嘉 (2004)。〈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僱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台灣社會學》，8，43-97。doi:10.6676/TS.2004.8.43
- Dill, B. T. (1994). Race, class, and gender: Prospects for an all-inclusive sisterhood. In L. Stone (Ed.) *The education feminism reader* (pp. 42-56). New York: Routledge. doi:10.2307/3177687
- Gould, Roger V. (1995). *Insurgent identities: Class,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paris from 1848 to the commune*.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doi: 10.2307/2580430
- hooks, bell (2014). *Teaching to transgress*. Routledge. doi:10.4324/9780203700280
- hooks, bell (2015).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Routledge. doi:10.1086/494279
- Lyshaug, B. (2006). Solidarity without “sisterhood”? feminism and the ethics of coalition building. *Politics & Gender*, 2(1), 77-100. doi: 10.1017/S1743923X06060041
- Morgan, R. (Ed.) (1970).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Magarey, S. (2014). Sisterhood and women's liberation in australia. In *Dangerous ideas: Women's liberation – women's studies – around the world* (pp. 25-42). South Australia: University of Adelaide Press. Retrieved from www.jstor.org/stable/10.20851/j.ctt1t305d7.7
- Nussbaum, M. (2003) 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 Sen and social justice. *Feminist Economics*, 9(2-3), 33-59. doi: 10.1080/1354570022000077926
- Walker, M. E., Wasserman, S., & Wellman, B. (1993). Statistical models for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2(1), 71-98. doi: 10.4135/9781452243528.n3

- West, C., & Fenstermaker, S. (1995). Doing difference. *Gender & Society*, 9(1), 8-37. doi: 10.1177/089124395009001002
- Young, I., M. (1990). *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uval-Davis, N. (1997). Women, citizenship and difference. *Feminist Review*, 57(1), 4-27. doi: 10.1080/014177897339632

附錄：訪談對象及研究蒐集方法一覽表

編號	姓名（化名）	深度訪談	焦點訪談	身份
1	艾薇	D	N/A	菲律賓籍移工
2	小鈴	D	F	中國籍新住民
3	藍莓	D	F	中國籍新住民
4	雪莉	D	F	中國籍新住民
5	金枝	D	F	越南籍新住民
6	桃子	D	F	越南籍新住民
7	水仙	D	N/A	越南籍新住民
8	泰莎	D	N/A	臺灣籍社工
9	小齊	D	N/A	臺灣籍學習支持者
10	花花	D	N/A	臺灣籍社工
11	李旋	D	N/A	臺灣籍社工

Re-thinking the Prospect and Restriction of Sisterhood through the Action of Visual-Empowerment for Female Immigrant/Migrant Workers Organized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Wan-Ching Ke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 on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sisterhood" in organizational tasks through the action of Visual-Empowerment organized by thre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NPO) for female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community connec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are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multiple intersectional subject identities of sister community members under the differences in nationality, class and cultur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works of female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present gender-conscious and ethnic-conscious, the 'public issue recognition' and 'personal learning needs' are the main motivations for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sk of the organizations. However, the support based on 'private' sisterhood was an important precondition for most female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to complete the video works, this reflects the considerable cohesiveness and activism of sisterhood, but it also reflects the limitations of sisterhood in term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in 'resistance to oppression'. In summary, the private 'companionship' sisterhood cannot easily be transferred and developed into the public, emancipatory sisterhood, but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private sisterhood based on friendship, the public sisterhood with social movement concept will not occur either.

Key words: Sisterhood, Female immigrants/ migrant workers, action of visual-empowerment, NPO, Self-narrative documentary